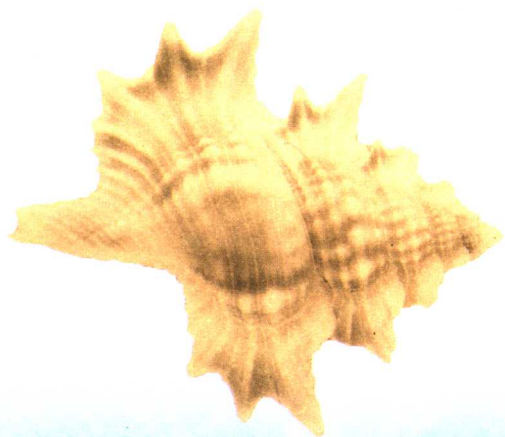


潘富恩

自选集

上 / 海 / 著 / 名

学 / 者 / 文 / 集



重庆出版社 ▲

上 / 海 / 著 / 名 / 学 / 者 / 文 / 集

潘富恩 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富恩自选集/潘富恩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0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ISBN 7-5366-4274-1

I. 潘… II. 潘… III. ①潘富恩-文集②哲学-研究-中国-
现代-文集 IV.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697 号

责任编辑 陈 慧 苏晓岚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潘富恩自选集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5 插页5 字数515千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66-4274-1/B·92

定价:38.00 元

作者小传

潘富恩,1933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后改攻哲学。曾任复旦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参与编写《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中国思想家传记汇论》、《中国哲学三百题》等作品,担任副主编、主编。个人著作有:《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等作品,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要刊物上。

作者传略

我于1933年12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潘子章早年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艺文学校毕业后,又去上海三育神学院就读,以后为基督教安息日会浙南教区的牧师,擅长英语及古诗词,颇具辩才,然年甫四旬患肺结核病逝。我时值六岁,因避日寇飞机轰炸,一家人随母亲由温州城内而迁居郊外,即原永嘉县上河乡,也正是南宋永嘉学派巨子叶适的故乡,现属温州市瓯海区。母亲徐淑良是产科医师,自开诊所,独身守寡,抚养子女。在乡下从事医务工作六十余年,现年九十又七,尚健在。我自幼生长农村,对旧社会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受欺压的境遇是耳闻目睹的。母亲总是想要我通过读书以求有较好的前途。我就读当地的中心小学,但是每逢寒暑假,母亲命我去邻村的一位姓丁的清末秀才处习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童蒙读物。因为母亲认为当时小学课本中“小猫跳,小狗叫……”太肤浅,必须另外补充点传统的东西。年渐长,母亲便要我背诵《古文观止》中的《桃花源记》、《陋室铭》、《卖官者言》等等。在母亲的督监

之下，能最初地接触到一点古文知识。

中学时代开始，我进城就读教会学校——浙南三育学校，在校喜欢阅读文艺作品，不习惯于教会学校的种种清规，一等到初中毕业，就考入瓯海中学高中部，当时教语文的老师游任逵先生，他讲课比较洒脱、国学根底厚实，吟读古诗时抑扬顿挫，富有韵味，他批学生作文成绩是具特有的方式，打一个圈20分，加一点是一分。及格者为三个圈，一次我的作文被批为四个圈加五点，便是85分，为全班的最高分。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可说是我以后向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发展的契机。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即1949年5月，温州市解放，同学中参军，参干者甚多。我也曾报名参军，未去成。1950年年初，遵母命，转学往南京中华三育学校继续读完高中，这时该校有一位年已75岁的老教师原是文史界知名的老前辈顾实先生，他晚年皈依基督教，性情有点怪癖，给我们上第一课时，就要大家用文言文写自传，全班同学也只有我还能“之乎也者”地凑成一篇，于是受其赏识，亲授以《说文解字》，《昭明文选》，他对我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是打下了一些国学的基础。

高中毕业，回上海姊姊家，统一高考时间已过，我于是便考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了一年，这一年内政治运动：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该年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写了纪念鲁迅的文章，收入校内专刊。1952年院系调整，按专业，我们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郭绍虞先生为系主任，有刘大杰、陈子展、朱东润、吴文祺、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王遽常、方令孺，还有年轻的教授贾植芳、讲师有鲍正鹄、蒋孔阳、王运熙、吴裕树等。中文系的教师阵营非常强大，我们学习也较认真，全班三十二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学业上的发展方

向,有的钻研美学、文艺理论,有的埋头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的,反正各人搞各人的。安排的课时甚少,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我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了《墨子间诂》后,写了《墨子散论》,此乃幼稚的习作而已。这时班级里崭露头角的该是我的老乡施昌东,他在《文史哲》发表了《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也是他招祸的根由之一。我撰写的本科的毕业论文是《论汉代的乐府诗》。我们正面临着毕业,各人怀着美妙的理想,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震惊于世的“胡风反党集团”案的风暴平地掀起,我们班级里的同学受不同程度牵连的竟达三分之一,施昌东被捕,有的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受批斗,弄得人人自危。我由于平日木讷少言,且喜欢搞古典文学而与文艺理论较疏远,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庸之辈,因而避免“胡风”案连累,被学校留下当助教,起初是要分配在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后被改调为学校政治课的哲学助教。我学生时代原本对哲学不太感兴趣,且抽象思维能力不强,觉得不适宜搞哲学,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学在“运动”中已被整得七零八落,自己能有这样的安排已属万幸了。于是也就跟着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做点教学辅助性的工作,同时旁听苏联哲学专家柯斯切夫的课,也逐渐攻读马列哲学的某些原著,以弥补往日在哲学知识上的贫乏。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第一届招生,我作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而1956年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筹建哲学系,师资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进修,欲以“借鸡生蛋”。当时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十来位知名教授,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此外有朱谦之、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

华、马采等。副教授任继愈，讲师朱伯崑。我被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更懂得为人治学的道理，他是我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由此也奠定了我一生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方向。在北大进修期间，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讲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卢、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我受益很大。1957年春天还在北大未明湖旁的临河轩，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会，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会上争议甚激烈，我参加了会议，增添了不少见识，我作为来进修的小字辈人物，自然是仅仅列席旁听罢了。我在岱年师的指导下，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哲史的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后，我向北大图书馆古籍珍藏室，借阅了有关宋明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有关资料，准备再继续撰写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岱年先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按百分比”硬“划”了进去，我也只好中止在北大进修，提前返回复旦。

1958年初，我被派至上海远郊蕻溪乡劳动锻炼，名之曰“下放干部”或称之“当新农民”，而哲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则至浙江海宁“下乡办系”，宣称“锄头里出哲学”。时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我也很快地成为农民中的一员，往往“挑灯夜战”，甚至睡倒在田头过夜，当时刮起“共产风”，大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神话般的产量报道刊载于种种报刊，人们也不可有任何怀疑，对农村干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凡说了真话的则作为“白旗”拔掉，说空、假、大话的人，却作为“红旗”掌权。我在农村期间，脑子里就是一个“熬”字，拼了命的干活，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去思考，也听信“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便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对公社干

部郑重其事地宣布某时某刻“共产主义到咱公社”的荒唐事，当时不但不觉得可笑，相反，心中如存有怀疑，便有种犯罪感。这是当时环境的普遍心理。

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之后，我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我帮他上辅导课，同时自己也逐渐上一些断代的中哲史课程，这时候有一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转来我系，原因是他新婚的妻子迦丽亚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留学。照顾他俩团聚于上海的缘故。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所以在校里很显眼。那时的中苏关系虽在最高领导层里已呈紧张，但在广大老百姓中却毫无所知，依然还以为其友谊是“牢不可破”。

我们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生活上有特殊照顾。因这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仍供应他充足的黄豆、牛排、猪排等食物，乃是令人羡慕的外国专家的特遇。领导上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的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地讲，他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我讲解亦未必很准确，他的理解更有一层隔膜，究竟与原义相距多少？也只有天知道。不过，他非常用功、刻苦，因为他日以继夜地攻读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所以我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话》来讲解。我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时间辅导他，并因此摆脱了其他教学任务，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我才算完成了任务。我在辅导季塔连科的二年多时间里，也学到他的刻苦学习的精神，同时也迫着我提高自己中国古典哲学的水平。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我与他从不通信

息,“文革”期间工宣队还为此专门审询我一番。可时隔20年的1980年,我又突然被学校外办通知说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他的老师——胡曲园教授和我。当时中苏关系虽稍有解冻,但我们还是有一定顾忌。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他热情地与我与胡老拥抱后,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们在‘文革’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后来我才知道,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20年前他归国后,凭《墨子思想研究》获副博士学位,该书第一版印了五万册,后他又获科学博士、科学院院士的头衔。他曾是前苏联戈氏总统的远东政策顾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作出过努力。1989年年底至1990年初,他邀请我以“苏联科学院的客人”身份去莫斯科访问,一切费用和回程路费皆由对方负担,我访苏不久,苏联便解体了。

以上一段穿插叙述我与季塔连科交往的始末。现再接着说,我1959年从“下放”回复旦,担任教学工作,主要包括辅导季塔连科外,也撰写点有关宋明理学的文章,写过论朱熹、陆九渊思想异同问题探讨的文章“谈鹅湖之会”,在《学术月刊》1961年7期上发表。我这时期也仔细阅读了《朱子语类》和《晦庵文集》,写了《论朱熹的哲学思想》长达一万五千字。《哲学研究》编辑部认为该文对朱的评价过高,未采用,我便搁置起来,直至1981年于《浙江学刊》复刊号上才发表《论朱熹》。

我的同乡同学施昌东,著名美学家,他政治上历经坎坷,1955年“胡风”案被捕,1957年“反右”扫尾,补上“右派”。1960年“脱帽”后,仍受歧视。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我深知他的为人正派,好学深思,才华横溢,虽数次政治蒙冤,仍潜心研究美学。我并不由于他身处逆境而疏远他,相反,我一直把他作好朋友而毫不顾忌的同情他,鼓励他,并经常同他在一起

谈论学术问题。当他从研究美学理论转到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同我探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开始合作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当时“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学界讨论正热,已发表近一百篇文章,为此,我们俩人,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和注疏,汇合各家争论的焦点,我们煞费苦心,从老子哲学的逻辑结构上,找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道”是老子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终极点,是它的基石,也是它的核心。而“道”即虚无。“道”既然是“无”,而天地万物为“有”,那么,“道”的变动的全部过程就是:“无—有一无”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篇《论老子‘道’学说》发表于《文史哲》杂志1962年的第4期上,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曾先后加以摘要报道。

60年代之初,我注意到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深入对中国哲学范畴和命题作专门探讨的重要性,于是我试图开始作系列的专题研究。为此我的第一篇范畴、命题的专文是《论格物致知》,作了较全面的历史性的探讨。此文发表于当时《新建设》杂志1963年3期,本来原计划还有:形与神;有与无;有对与无对;形上与形下等范畴,陆续撰写专文,但不久就接连下乡,参加了长达二年的一、二、三期的“四清”运动,此期间也偶尔撰写“道德”问题的讨论,不久便“文革”了。

“文革”期间,多数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我却因1958年下放农村,与当地一个女青年产生爱情,而后结成夫妻,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贫农,且与相继出生的三个子女一直都在乡下的岳父家,“文革”是讲阶级出身的,我由此沾光而得以免遭“造反派”的审查,省去了许多麻烦。在“文革”期间以至1983年之前,每逢农忙季节和星期日,都要骑自行车往乡间参加劳动,含辛茹苦达二十余年。葱花、酱油汤是家常菜。直至1984年小平同志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才将家

属农转非调入复旦。

1971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我被认为是“可以当教师”,获准给学员们开设写作实习课,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出“学一点哲学史”的指示,于是,我又开设中国哲学史课,虽然在讲授的内容上免不了违心地讲一点“适合时宜”的话,但总算可以合法地重温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而不致使自己喜爱的专业全然荒废。在此期间我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通俗读物《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0万册,当然,该书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介绍中国古代认识论时具有简单化的倾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更明确地表达在“文革”期间无法表达的观点,我在80年代初,对原书作了全面修改、增补,以《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为书名,列为《复旦小丛书》于1985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为了肃清“评法批儒”中的恶劣影响,我也积极地撰写文章批判揭露“四人帮”影射史学的阴谋伎俩和用心。如1977年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四人帮”搞反革命权术的铁证——揭露姚文元授意注释〈韩非子·说难〉的险恶用心》等文章。

1978年,在山东济南的南郊宾馆,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我也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大家认真地讨论中国哲学史如何拨乱反正,如何科学地重建这门课程。接着于1979年,在山西太原的迎泽宾馆,召开了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全国性的研究会,我也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的全国中国哲学学会,推选张岱年为会长,还有分布各省市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选理事。我算是代表上海地区的,列入理事名单中。

根据我自己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也包括若干与施昌东合作的部分,论文以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居多。先秦的有《论春秋时代‘物生有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简论·〈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论墨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论孙武、孙臆‘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论名家从朴素辩证法走向诡辩》。此外还有与人商榷的文章,一篇是针对包遵信在《历史研究》1977年4期上发表的《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的这篇文章,于是撰写《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与包遵信商榷》另一篇是与丁宝兰先生商榷“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宋明部分发表了《论朱熹》、《论吕祖谦》、《论方以智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此外,也发表中国哲学史专题论文,如《略论中国古代关于量变与质变理论的历史发展》;《略论‘理欲之辨’的历史发展》等等。

这时候,挚友施昌东已患癌症几年,病中已出版了《美的探索》、《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且写自传体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去世后,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我与施昌东商量将我们合作撰写的论文能编为一集出版,作为我们友情的纪念。重庆出版社欣然同意出版我们的论文集。出版社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施昌东弥留之际,也只看到了该书的封面设计,1983年9月施昌东溘然去世。这部《中国哲学论稿》于1984年7月出版6000册,很快售完。

1980年高校正式恢复职称的评定,我被评为副教授,这时日本国立新潟大学派来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复旦大学当高级进修生,名叫深泽助雄,他原是搞印欧比较哲学的,他来华主要的研究专题是宋明理学,学校里指定我当他的指导教师,这就成了副教授指导副教授了。我心里有点不自在,但我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心得体会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他,深泽也非常谦虚、好学,两人共同切磋,兴之所至,常谈到深夜。我带着他到杭州等地参加学术会议,也特地介绍他到北京拜会张岱年先生和我的同窗好友张立文。我辅导他用中文撰写二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一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学的概况》,1981年发表于《浙江学刊》,另一篇则是《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比较》,此文达二万余字,经我与张立文的推荐,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发表,这些成果颇引起中、日学界的重视。深泽回国前夕为了表示感激之情,竟然向我行了三次叩拜礼,使我不知所措,此事被中哲史界传为佳话。深泽归国后不久升任教授,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文化交流的热心者。1985年我随学术代表团赴日本筑波参加国际退溪学会,深泽闻讯后,特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来东京机场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课,一连几天陪着我们活动,这种讲究师生之情的表现,令我们代表团内的同行感慨不已。

继深泽助雄之后,有来自比利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硕士)的尼古拉·司汤达,汉名为钟鸣旦,他来复旦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研究的课程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主要给他讲程朱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他以明末杨廷筠思想为论文的选题,他阅读了有关的大量资料,除跑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外,南京、北京等地也去查阅。此外他注意实地考察,到杨廷筠故乡杭州一带寻找遗迹,为了了解明末海外交通,西学东渐的窗口,我带他去福建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观实习。他写成论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回国后取得博士学位,论文用英文、中文二种文字出版,英文版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中文版是香港出版,长达五十余万字。现他任职鲁汶大学汉学系系主任。此外,我还指导过德国的翟开林(汉名)他研究中国古代时空观,现是德国的一位有点知名度的汉学家。

80年代初,我教学上的任务,较多的是指导外国高级进

修生和国内的进修教师(或访问学者),国内的有来自昆明、厦门、广州、宁夏、拉萨、乌鲁木齐、重庆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维吾尔族的教师,他们学中哲史,是想与他们的少数民族思想史相结合。他们问学于我,我不敢以师长自居,完全以学友间关系共同切磋。现在这些当年来我处进修的,也几乎是已退休或将退休的教授了。

在科研方面,1980—1985年之前除发表近三十来篇论文外,在专著方面,有与施昌东合作的论文集《中国哲学论稿》出版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认识史略》,本书简要地记述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对立发展的历史,评析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派,从中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学习和了解我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有一定启迪和辅导作用。

我长期来,酝酿着如何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问题。对于叶适、陈亮以往学界注意较多,而对浙东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吕东莱(祖谦)则研究不够,实际上吕东莱是调和朱、陆而又吸取永嘉“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他那兼收并蓄的“杂博”思想特点,正是南宋学术思潮的反映,于是我开始发表了《论吕祖谦》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写了《吕祖谦思想初探》198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南宋的浙东的金华学派吕祖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成为国内近40年来研究婺学的第一部著作,起了填补中哲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的的作用。

1985年,我晋升为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究主任,亦被推选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定系里教师评定职称的工作,这是个最为敏感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但我还能主持公道,受大家的信任,所以能连任至今十多年。我是复旦哲学系建系时的助教,至今43年,老一辈的都作了古人,与

我同辈的都离、退休了，我算是系里唯一在职的建系时的“元老”。

我开设课程的内容和特点：80年代以来，曾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史、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但内容上分有不同深浅层次。方法上亦因讲授对象的特点而不同，我讲课不事声华、较重视典籍史料的疏解考证等基本功训练，亦重义理上的扶发，我80年代主要是为本科生讲课，带硕士研究生，毕业若十一名。自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以来，主要是指导博士生的工作。因为我专业的博士点，原来只有我一人为博导（严北溟教授1990年去世），所以带博士生的任务繁重，至1998年，我有十七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大都已出版，其中有二部已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上出版，还有的也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青年的一代，潜力甚大，真可谓后生可畏，作为一名教师，为此颇感欣慰。

在80年代的中、后期，我主要的科研活动，集中于参加编写三部辞书和撰写一部专著。第一部是《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严北溟为主编，我任副主编，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的条目，第二部是《中国思想家传记汇论》王蘧常任主编，我为副主编之一，负责撰写宋明部分传记的诠释。第三部是《中国哲学三百题》是与夏乃儒、祝瑞开、丁桢彦共同主编的，此书是以问答形式，分别解答中国哲学史有关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等几个部分，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明白，能为广大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所欢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尔后又再版。

然我主要的精力，是在完成撰写《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在此之前，即1980—1981年，我已开设《程朱理学研究》

的课程，向硕士生讲授。逐渐形成一本略具规模的讲稿。1982年，应邀赴兰州大学哲学系，专门为哲学系本科生讲授程朱理学课，是一个月左右，兰州大学学生的好学精神，令人感动，白天讲完课，晚上尚有同学们结伴而来我的住宿处，以求解答疑难问题。我的讲课内容亦经他们录音整理、印发。那时兰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刘冰同志，他不惜校内经费开支，为文、史、哲的学科建设，聘请全国知名学者来兰大讲学。正因为有了《程朱理学》的讲稿基础，给了我撰写二程有不少方便，关于朱熹的思想研究，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同乡、同行张立文教授，已有专著在1980年出版。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程颢、程颐的研究上。我认为对二程的著作，必须仔细的阅读，娴熟于胸，全面的思考，一定要把文章做足。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也给了我不少写作方法上的启发，我的学生徐余庆在上海铁路局工作，他长期问学于我，且有相当的中国哲学功底，由他在业余时间协助我整理、摘录二程资料，订立篇目，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先陆续撰写一些论文发表，投石问路，欲以此请教学术界的意见。

有关二程的论文在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约八篇，如二程的认识论，程颐的辩证法思想，二程伦理学说，教育思想，人才观，政治观，对佛学的批判和吸取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论二程的变革理论和对熙宁新政的态度》，发表于《学术月刊》，而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的基本论点：程氏兄弟对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变法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种种责难。然而二程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历来所说的守旧派或顽固派与革新派之间的斗争。尽管他们在“治国之要”的看法上和做法上表现不同的政见，但二程仍然是属于历史上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这种一反以往的因循旧见，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